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余建斌

时事聚焦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伏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

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

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

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惊人的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

落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来源:人民日报)

大学生缴公积金,价值不宜高估

■邓新华

据新京报报道,武汉、成都等5座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就自由职业者和在校大学生自愿缴存使用公积金等议题达成合作行动计划。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农民工、在校大学生等群体在这5座城市可自愿缴纳住房公积金。

前两年沈阳出台大学毕业生可零首付买房的规定,被舆论解读为“去库存”。眼下房价高涨,这几个城市也没有去库存的迫切需求,这个大学生缴公积金的所谓“计划”,看起来更像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一次形象工程行动。只是,这一行动价值几何,恐怕要靠现实来检验。

应当承认,公积金的根本功能是住房保障功能,其本质是以住房公积金形式给职工增加一部分住房工资,从而起到促进住房分配的目的。

而长期以来的现实是,我国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受益对象是有固定工作单位的在职职工,把大学生排除在外。如今5省会城市鼓励大学生自

愿缴纳住房公积金,无疑扩大了公积金的受益面,对减轻大学生以后的住房、租房压力有一定好处。

但问题是,学生缴公积金,并没有企业帮缴相等的份额,这对于一般没有什么收入的大学生来说,会构成一定压力,所以估计这个计划很难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很显然,家境差的大学生缴公积金,基本上相当于给社会上或者同学中那些能够尽早买房的人提供补贴。

当然,这个大学生缴公积金的计划是自愿的,家境不好的大学生可以不缴,这比企业员工强制缴纳公积金要好。但另一个问题不能被忽视:有些富裕家庭的学生,其父母可以帮他们缴公积金,以便他们一毕业就买房,而这,相当于富裕家庭占了社会上被强制缴纳公积金的底层便宜。

要让人们更容易买房,不能靠大学生缴公积金,而是要靠更多的供给、更稳健的货币、更少的泡沫、更好的创业环境、更轻的税收。(来源:新京报)



“一刀切”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既是政治任务、民心工程,也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清洁生产的助推器。某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日前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执行环保管控措施,不论企业是否环保达标,一律实行错峰停产,有的达标企业因此被关停4个月。针对这种现象,业内专家认为,环保管控要精准施策,营造良好的管控导向。 ■新华社 翟桂溪

化繁为简有利于教育公平

■樊大或

4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发布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意见,备受关注的小升初政策随之尘埃落定。今年,在小升初已实施近十年的推优入学将全面取消,推优招生政策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将继续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进一步降低特长生入学比例。

小升初推优,是指根据小学生的身体素质、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等标准,选出一些优秀学生向重点中学进行推荐就学。此前,“推优入学”作为小升初的入学方式之一,其出现的本意是为了遏制择校乱收费等不良现象。小升初推优政策实施以来,对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均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相关争议也越来越多。

在小升初推优政策实施期间,推优学生比例一度呈现扩大趋势,同时,学生获奖、评优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市、区、校三好,各级少先队标兵称号、十佳少先队员称号等,都逐渐纳入推优的范围。为了能评上三好学生,一些学生的生日会变成了拉票会,为了拉票,过生日的“寿星”会反过来给同学送礼。推优政策有

可能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学生关系功利化。另外,在推优的过程中,学生的统测成绩排名分量越来越重,这也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分数、排名、获奖、评优,各种事关学生切身利益和前程的敏感词交织在一起,让小升初推优政策的实施变得越来越复杂、沉重。“推优”实行多年引发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对许多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和孩子而言,“推优”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了进名校,有的学生不停奔波在赶赴各种培训班的路上,有的家长则通过各种途径递条子、拉关系。

小升初推优在经过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之后,其功利主义色彩已经越来越浓厚。此时,北京市教育部门终于下决心取消推优招生政策,化繁为简,让所有学生回到相同的竞争原点。全面取消推优入学,不仅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在全面取消小升初推优这一入学方式之后,要防止一些不良现象乘虚而入挤占优质资源。有关部门要谨防一些名校通过新名目来吸引、垄断优质生源,同时,也要谨防一些家庭凭借金钱和特权来抢夺优质教育

资源。所有名校必须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下,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地接受学区内学生就近入学,让北京基础教育呈现更加良性、健康的新生态。

取消小升初推优、降低特长生入学比例等举措,并不能完全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问题,但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的北京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正在推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越走越稳。近几年,北京市加大了改革步伐,通过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名校办分校,以及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等办法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程度,对义务教育公平、均衡、优质,形成了有效推动。

小升初推优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学习负担,不利于孩子的可持续发展。取消推优之后,也并非就能顺利迎来教育公平的春天,因为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北京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北京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内容和模式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扩大,每个孩子都能公平地就近入学、上好学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实现。(来源:北京青年报)

驱散电影票房造假的雾霾

■朱昌俊

据媒体报道,对北京米瑞酷电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日坛店)瞒报销售收入47550元的违法行为,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日前给予其罚款20余万元的行政处罚。这是我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全国文化执法领域打击电影院瞒报销售收入的第一案。

电影票房造假现象,犹如笼罩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层雾霾。过去,由于制度规范缺失,一些电影的票房造假即人尽皆知,也只是为舆论场增加了热点话题,很少受到实际约束。这种状况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破窗效应”,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和资本的强势介入,票房造假变本加厉。

3月,电影主管部门共曝光326家影院存在瞒报票房情况,其中63家影院瞒报票房超过100万元。而这仅仅是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后曝光的第一批,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对电影行业而言,票房造假堪称毒瘤。较之瞒报,虚报票房问题更受关注。通过人为操作制造出亮眼的票房数字,制片方、导演、演员、投资方和院线等看似都是赢家,但实际上却是对电影行业基础秩序的破坏。因为这意味着,票房作为电影行业的重要“体温计”,因人为因素的影响而紊乱,无法正常地反映观众对一部电影乃至电影行业的评价,同时也给电影创作带来误导。

强化监管、明确规则,加大对造假行为的打击力度,成为清除电影市场隐患的基础工作。事实上,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

步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电影创作更多地回归艺术创作和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应构建制度规范体系,对票房造假的规制就是其中一部分。

除此之外,谈及中国电影票房统计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差异,不少行业人士都提到一个例子,那就是北美地区设有专业的第三方电影票房统计机构,大大减少了院线、发行方对票房数字“下手”的概率。我国虽然也有相关部门做票房统计,但由于在统计结果的共享程度和透明度等方面存在不足,票房的发布口径和统计标准缺乏权威性,为造假留下了口子。同时,由于票房数据与影院的票房营业税征收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导致出现“吹牛不上税”的现象,也使得发行和院线对票房造假更无顾虑。

健全而严肃的票房统计制度,是现代电影工业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票房统计的权威等具体制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与电影行业的“价值观”健康与否有关。比如,电影行业到底如何看待票房之于电影本身的意义?如果“唯票房主义”成为电影行业的铁律,各方在票房上“动手脚”的主观动机恐怕不会小。综合来看,从外部规制上加大对票房造假的惩治力度,只是清除电影行业雾霾的第一步。一个电影大国不可能建立在虚假的票房之上,票房的“水分”如何事关中国电影的未来,也必须上升到整个电影工业的现代化角度去求解。(来源:光明日报)